

The Trickiness and Reality of “Time”

Zhang Xianglong

Abstract: “Time” has always been an issue of central concern for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The “time” as tackled in philosophy is a living experience of human being rather than the “mechanical time” studied by physics. Since ancient Greece, much attention had been paid to the explication of time’s nature by philosophers. Basically, the Greeks attempted to grasp the nature of time as a “presence,” because it is the sole dimension in time that can be experienced here and now. This caused trouble in understanding time as a lively whole and made arguments such as Zeno’s paradoxes on motion a sustained moot point. In modern society, due to wide application of clocks and great changes in the ways of production as well as living mode, the experience of time is so much conditioned by calculation and objectification that human beings end up slaves of time. As the Buddhist Yogācāra school and phenomenology both hold, the essence of consciousness is time. Time is a stream in which the past and present are mingled in the same water; in which same stream people young and old are all bathed but undergo different sensations. People cherish life and wish they could prolong their lifespan because longevity allows them to experience richer meaning in life. Since meaning can only exist in time, the flow of primal time is literally the primal meaning. Human being in its infancy has entered a fluid world of torrential meaning, and has since tried by different means to construct and decipher time and its meaning.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focusing on time’s institutionalized and manipulatable present phase, tried to locate eternity and truth beyond time; the Yangzhu School of ancient China propounded a theme of *carpe diem*; while Confucianism propagated a life philosophy of traveling along the stream of time, always laying emphasis on a sense of right “timing”, believing the key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uture was to be found in the intertwining network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e Confucian middle way (the golden mean) is essentially to swim unhurriedly in the middle of time stream. In sum, rationalism, the main stream of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takes time as sub-reality and so strives to transcend it in order to reach the ultimate truth. On the other side, the ancient Hindu *Upanishad* tradition tends to regard time as the illusive manifestation of reality (Brahman or Atman). As the contemporary astrophysicist A. Frank points out,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has continually precipitated the changes of human being’s perception of time.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tech and sciences has strengthened modernity, the time experienced by human beings has become more in line with the objective time of physics, in consequence of which the meaning of life is reduced to an ever contracting space, leading to the spontaneous resistance against time in its modern sense from some people. Therefore, in order to come back to the fulfilling and life-enriching time, it is necessary for human being to go by the inner measure of time, and to reinstitute both time and meaning in their primal sense. Freud propos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consciousness and sub-consciousness, arguing that only a balanced combination of the two can ensure a healthy mentality, a fully realized participation in the real meaning of life; Bergson finds that to deteriorate time into static space blocks the “duration” of time and therefore makes human unable to meet true world and life.

Keywords: time; primal time; primal meaning; illusion-making (maya)

Author: Zhang Xianglong earned his BA in 1982 from Peking University and MA in 1988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oledo, Ohio, USA; he received his PhD in 1992 at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USA. He became a full Professor in 1999 at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f Peking University. He has been a Top Grade Professor since 2012 at Shando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areas are East-West comparative philosophy, Western contemporar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Confucian philosophy. His publications include: *From Phenomenology to Confucius; Heidegger’s Biography; Thinking to Take Refuge: The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ies in the Globalization; Heidegger’s Thought and Chinese Dao of Heaven;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Opposing Qin, Prospering-Han and Responding Buddhist Challenge---From Zhongshu Dong to Xiangshan Lu.*

南
國
學
術
思
想
者
沙
龍

“時間”的奇異與真實

張祥龍



[摘要] “時間”一直是東西方哲學關注的話題。哲學意義上的時間是人所體驗到的活時間，而非物理學所研究的客觀的時間。從古希臘開始，哲學家們就注重對時間的解讀。古希臘哲學把握的時間以“現在”為基礎，因為現在的時間是唯一被當場體驗着的時間，由此引發了對時間的困惑，使得芝諾提出的“運動悖論”一類的怪誕命題得以堅持。而現代社會的“時間”，由於鐘錶的加入和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人們對時間的體驗被計量化、客觀化了，人變成了時間的奴隸。正如唯識宗和現象學所認為的，意識的根本就是時間。時間是一條河流，糾纏着過去和現在，不同年齡段的人對生存的感受也是不一樣的。人類之所以珍惜生命，並且要延長壽命，在於壽命的延長可以體驗到更多的意義。由於時間承載了意義，所以，原時間的流動就是原意義。

人類從嬰兒時期就進入了意義湧流的世界，用不同的方法來參與構造和解讀時間及其意義。西方傳統哲學尋找超時間的永恆和真理；專注於體制化和可操縱化的現在時相；中國古代的楊朱學派看重當下的享樂；儒家學派則倡導與時間同行，從過去或古代與現代的交織中得到理解未來的鑰匙，要因“時”而動。儒家的中庸或中道從根本上說來就是從容於生命時間之正中。總的說來，在西方傳統哲學的主流唯理論那裏，認為時間不夠真實，希望超出時間；東方的印度教《奧義書》認為，時間是真實的幻覺；而天體物理學家弗蘭克則認為，人類的技術改變促使時間觀念的不斷改變。由於高科技發展加強了現代性，使人類體驗到的時間與物理上的客觀時間不斷趨近，人生的意義空間被不斷擠壓，人們開始不斷自發抗拒現代性的時間。因此，人們想要獲得飽滿而又幸福的時間或者人生意義，就要把握時間的內在尺度，重新啓動原時間和原意義。弗洛伊德提出了“潛意識”與“顯意識”的區分，祇有兩者結合與平衡纔能達到意識的健全，並體驗到人生的真正意義；柏格森則認為時間被空間化、被割裂，阻礙了時間的綿延，使得人類無法體會到真實的世界與人生。這就需要借鑒儒家的智慧，通過修身齊家參與對時間的更化轉變，將時間關係調整到其原發形態，從而得到道德和真理，獲得真正的人生意義。

[關鍵詞]時間 原時間 原意義 幻化（摩耶）

[作者簡介]張祥龍，1982年在北京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88年在托萊多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1992年在布法羅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99年起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2012年起任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人文社科一級教授，主要從事東西方哲學比較、西方現代歐陸哲學、儒家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海德格爾傳》《從現象學到孔夫子》《思想避難：全球化中的中國古代哲理》《海德格爾思想與中國天道》《拒秦興漢和應對佛教的儒家哲學：從董仲舒到陸象山》等。

引言

“時間”既是最有哲學韻味的問題，也是讓傳統形而上學感到困惑並因而要逃避的問題。古今中外的敏感哲人大多會關注到它，但由於不同的思想方式，對待它的態度和理解路子有着極大的差異。

簡略來說，西方傳統哲學的正宗比如唯理論，是比較貶低時間的純思想價值的。因為，“時間”與“變化”內在相關；而唯理論追求的“理”，比如畢達哥拉斯（Πυθαγόρας，約前580—前500）的“數”、柏拉圖（Πλάτων，約前427—前347）的“理式”（理念）、亞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的“實體”和純形式、笛卡爾（R. Descartes, 1596—1650）的“我思”等等，都是要超出變化達到不變的永恆和確定性的，所以他們對時間的含義理解不深，無非是看作存在的一種次級形式，有前後可言的數目或心靈的延伸，甚至是人類墮落的標誌。他們側重於時間的“現在”這個向度，因為它是時間三向度中最容易被理智把握的在場者。

印度古人對時間的體驗更豐富，也更多樣，但總的說來，他們的正宗哲理認為時間是對真實（梵、大我、絕對意識）的幻化，要體驗真實，就要將這種外加到真實上的形式或名相去掉；而他們的非正宗哲理，比如佛教中“大乘”的一些學派更加看重時間。以龍樹（Nāgārjuna，約公元2世紀）的“中觀”和如來藏心學為例，他們都認為，沒有從邏輯上與幻化、假名無關的真實，“涅槃即世間，世間即涅槃”，“真如心”與“生滅心”無法完全分離，人祇能在生滅之中而不是脫開生滅而得真如。

中國古哲人則認為，時間恰恰是智慧的源頭，陰陽造化就是時間的創造和轉化，《周易》的要害就在於“時中”^①。全部中國哲理史，特別是先秦哲理，可一言以蔽之曰：“道之時義大矣哉！”天道即天時，當然不止是四時意義上的天時，更是深刻的、富於天命含義的本源天時，孔子則是“聖之時者”^②。所以，中國古人在面對從絲綢之路上傳來的衆多宗教和哲理時，獨與大乘佛學中的般若中觀和心學有最深的感應，轉化出了中國佛學的各流派，又激發出了宋明道學。

一 “時間”之奇異

這裏所說的“時間”，不是那些可被測量的時間，比如宇宙時間、物理時間，而是被人們直接體驗到的和理解着的“活時間”。它既包括時間的流逝，也包括代際時間的經驗，以及滄桑起伏的歷史時間。雖然這種時間可以帶有主觀性，但這種生命時間並不是純主觀的，也有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面。當人們思考這種被人們直接地、共同地體驗到的活時間即純粹時間的含義時，如果將它作為對象來定位，也會遭遇理智上的挫折，讓人們對時間產生驚奇之感。

古羅馬帝國時期的天主教思想家奧古斯丁（A. Augustinus, 354—430）對“時間”有過這樣的評論：

時間究竟是什麼呢？沒有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想說明，便茫然不解了。^③ 奧古斯丁的體驗，也是每個人都能體會到的。時間的存在，體現在人的生命每一刻，所以，奧古斯丁纔會說，如果不被人追問時，我自然清楚時間是怎麼一回事。但是，當被別人問道：“你給我確切地說明白，時間到底是什麼樣的存在者？它是存在於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你想要說清楚、琢磨透它，卻發現很難做到。人們會發現，時間一旦被對象化，或被作為一種存在者來得到規定，那麼，它好像就消失了。

因為，真能作為對象體驗到的時間，祇有“現在”。而對於“過去”和“將來”，奧古斯丁

^① [清]惠棟：“易漢學”，《清人易學二種》（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0），卷七。

^② 《孟子·萬章下》（北京：中華書局，2012）。

^③ [古羅馬]奧古斯丁：《懺悔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周士良譯，第242頁。

認為無法直接體驗到它們，其他人也祇能以“現在”的方式來感知過去和將來；也就是通過想象力，將“過去”體驗為不再在眼前存在的現在，將未來體驗為將要來到的現在。所以，從原則上講，人類祇能直接體驗到現在這個時相，古希臘哲學家們基本上是持這一觀點的。但問題在於，如果時間祇是現在，沒有過去和未來的現在，還是時間嗎？現在如果與過去、未來沒有根本性的聯繫，就是跑不掉的永恆的現在，就不是真正的時間了，時間就被超越或漏掉了。就像“芝諾悖論”（Zeno's paradox）所說的，飛矢不動，因為飛矢在每一個瞬間都是靜止的，無數個靜止的相加還是靜止，就沒有了運動，時間也就停止了。

時間的“現在”相，又牽扯到“現代性”的時間問題。“現代性”其實就是現在性，也就是祇關注現在，而過去、未來祇是現在的陪襯或變體。因為，“現代性”或“現代化”代表這樣一種思想方法：將一切體驗都理智對象化、計算化、可操縱化。於是，時間也就成了被充分計量、分配和操縱的眼下之物。比如，泰羅（F. W. Taylor, 1856—1915）所創製的科學管理法，將生產線上工人的每一個動作的耗時都做了充分計量，再根據它將每個工人工作行為按科學標準來規定有效動作，於是大大提高了勞動效率。其實，整個現代社會也是按這個模式造就的：時間就是價值，價值就是金錢，金錢就是人生意義的對象化體現。所以，現代化社會的總體形態就是趕時間——既是驅趕時間，又是追趕時間。每個人的行動加快了，人們有效工作、賺錢和增加價值的能力提高了，好像是有意義的時間大大增多了；似乎這種社會的生活一定比傳統社會更有意義得多，人們的幸福感會更強烈得多。但情況並非如此。原因在於，人們僅僅可以控制那測量到的時間，而不是體驗到的活時間。時間變成了算計的奴隸，喪失自己的獨立性，而去算計的人也就被時間本身算計了，成了自己算計的奴隸。所以，現代人的生活缺少了內在的意義，總要靠追求某些人為的目標來獲得一時的或現時的意義。追根溯源，就在於原發時間流的消失，就像原本的澎湃江河變成了被大壩和水泥堤岸規範的發電水道。所以說，時間是不能被完全客觀化或數字化的，它有自己的節奏、速率和生命。現代人的生活之所以缺少內在意義和生存趣味，主要就是時間感消退，原時間被平面化、計量化了。造成的結果是，追逐、加快和操縱“時間”的人們，反而總在失去讓生命歷程發光的時間。

總之，時間之奇異就在於：人們把捉不到它，卻時刻感受到它；人們的過分努力在損害它，卻不得不從它那裏得到生活的意味。時間不是任人擺佈的，也不是任由人們“穿越”的。

二 “時間”之真實

為了突出時間的特點，這裏先做一個思想實驗：假設一個沒有時間祇有空間的世界，以及一個祇有時間而沒有空間的世界；如果祇能二擇一的話，你會選擇哪一個去生活？正確的選擇祇能是後者。因為，純空間的世界是無變化的，所以是沒意義的。例如，科幻小說《三體》描寫了一個全憑科技的算計理性來博弈的宇宙，就近乎一個最後大家一起滅亡的宇宙。高級文明一定會威脅到其他文明，也會被其他高級文明所威脅。其中一個場景，就是另一個高級文明把整個太陽系變成了“二維”（二向箔）的存在。但它是無意義的，主要不在於二維本身，而在於它的二維中無變化。所以，唯識宗和現象學都認為，意識的根本在於時間；祇要有時間，就有內在的騰挪空間。但可以反過來說：有空間，也必有時間嗎？似乎不必然。

由於人類能活生生地、長程地回憶過去和策劃未來，人類就比其他動物更有“能力”——無論是做好事還是幹壞事的能力。所以，“朝向事情(首先是人類意識和生存可能這樁大事)本身”的現象學不能僅僅關注現在。按照現象學的發現，時間的根底處不是“時間點”或“時間串”，而是“時間暈（圈）”和“時間流”。比如，人們在聽到聲音、旋律的經驗中，所聽到的不是一個個孤立的、純當下的聲音印象的序列，而是剛過去但又沒有退場的留滯和以非對象方式來臨着的將來所交織成的時間暈，以及由這些交織再交織成的時間流。所以，說到底，未來、現在、過

去三者之間雖有區別，不可混淆，但卻都是相互交融或糾纏在一起的，憑藉這種糾纏而有其自身的。時間是一條流而不是一條鏈，過去、將來也不是靠現在纔對人們的意識呈現的。可以說，現在是由過去和將來對生出來的，它並沒有終極的優先地位。更穩妥的說法是，時間的三個向度是相互依存共生的。

總體來看，人們的生活所“活”的，首先是時間，也就是原時間，以及它構建出來的原意義。問題的關鍵在於：是時間流本身就有意義，還是人們的心理體驗給予了時間流以意義？當然是前者。沒有時間流的構意，心理體驗根本就不可能。如果像傳統西方哲學所認為的，時間的重心是現在，那麼，這原則上孤立的現在就沒有原發的意義，要靠預設更高的存在如上帝或理念來賦義於它。如果時間像現象學講的那樣，是三個向度的差異和交織構成的，那麼，它本身就有差異和發生，也就是原意義的生成。“原意義”就是讓人願意活下去的東西。人為什麼會自殺？雖然各有各的原因，但一般說來，是他/她體驗不到生存的原意義了，感覺時間被扭曲了，時間原意流被阻塞了。如果進入到比較自然的時間流中，比如嬰兒的、得道者、得仁者的狀態，它的生命時間本身就在產生層出不窮的新意義，那麼生活就是蓬勃的，甚至是幸福的。這就與西方哲學所講的理念、實體或主體給予時間的意義不同了。現象世界的時間源頭本身就是意義的源頭。比如，在農業社會中，安穩的、無壓迫的農村生活形態本身就孕育着生命的意義，“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①。不同年齡段的人、面對不同生存可能性的人，他們所處的時間結構不同，對時間的體驗不同，感受的生命含義也就不同，感受的生活意義也不一樣，除非有精神上的追求校正這一結構。

這也就牽涉到另外一個重要問題：人是否應該追求永生不死？現代技術可能會讓二十一世紀出生的人的壽命大大延長，甚至有的科學家和商業集團在宣傳克服衰老，達到永生。但這裏有沒有什麼限度呢？如果知道自己能活一百五十歲甚至五百歲，那麼，他/她的人生境界就又不一樣了。比如，英國奇幻小說《霍比特人》（*The Hobbit*）中的主角比爾博·巴金斯，五十歲了還是青年，要去探險；《舊約·創世記》記載，亞當活了九百三十年，亞伯拉罕活了一百七十五歲，在一百歲時得到兒子以撒。這些人就生活在與普通人不同的意義世界中。由於現代性對時間的管制，人類很難體驗到原本的時間，而藝術則能帶來這一點，哪怕祇是短暫的。比如，欣賞畫作，閱讀有思想深度的書籍，到終南山修道，人的時間感受就會非常不一樣。現代技術對於永生的努力會導致另一種不同的人生形態，人類社會就會發生徹底的變化，進入所謂“後人類時代”。因此，過於長壽的甚至包含不死者的人類社會，也會發生另外一些問題的。

再回到原時間和原意義。以往認為兒童的生活是沒有深刻意義的，但是現代心理學研究發現，兒童三個月就表現出喜愛正義、厭惡不義的傾向^②，所以兒童世界是意義湧流的世界。時間就像一張可塑的紙，生命的意義就是以不同的方式來折疊它。這張紙的每一條折痕就是一簇意義，不同的折法產生不同的意義結構。

關於時間的流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達。“滾滾長江東逝水”，似乎表達的是從過去到現在再到未來；而“古往今來”，好像隱含着從將來流到現在和過去的意思。為什麼父母深愛孩子，因為他們感受到的代際時間很豐沛，順流而下；而長大的孩子逐漸對父母有看法，孝意識就會減弱，當自己再去養孩子時，又因體會到做父母的生存狀態而會去敬愛孝順父母，“孝”就好像是時間從現在和將來流到過去。另外的可能是：過去和將來相向流動到現在；又或者是過去已經流動到了將來，衝激出了現在，這是海德格爾（M. Heidegger, 1889—1976）的看法。西方哲學追尋超時間的永恆性、永恆的真理，都是基於現在。海德格爾則說時間的重心在將來，所以時間喪失了它的拋錨點，變得動盪，過去在前頭等我們。又或者是將來已經流到了過去和現在；另

^① [東晉]陶潛：“桃花源記並詩”，《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6。

^② [美]保羅·布盧姆：《善惡之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二〇一七年 第二期

外，還可以主張過去與將來交織出了現在。

人類追求原意義，也有不同的方式。現代性所追求的，是將對現在的重視加以體制化、現實化，也就是現在化。而有些古人也注重當下，比如中國的楊朱學派或古希臘的昔蘭尼派，認為享樂或享受當下感官快樂是最佳的生活狀態，是最值得的人生。它的反面，則是柏拉圖和基督教的超越論，主張人生的意義在於超出變化的、感性的現世，進入更高級的另一個世界。還有一種朝向未來的傾向，即“未來學”追求的立足於現在、朝向未來。比如，托夫勒（A. Toffler, 1928—2016）所著的《第三次浪潮》，就構想了科技的發展所帶來的改變。這種未來朝向，有樂觀的，也有悲觀的，比如科幻小說、科幻電影。看重過去和未來的則是儒家，通過返古情結，通過古代文獻和智慧來瞭解未來、進入未來。所以，儒家的《易經》講究進入到時間變流之中，隨着時間走，“與時偕行”，參與天、地、神、人的時間進程，調整時間結構，從而達到天下太平。

三 時間是“真實的幻覺(摩耶)”嗎？

在西方哲學那裏，認為時間不夠真實，希望超出時間；而東方的印度教《奧義書》認為，世界的基礎是“梵”或“大我”（阿特曼），無名無相，所以修煉者要拋卻自我，進入梵我中，纔能得道。還認為，人們生活的世界原本是“無明”造就，由於人們將名相加到本沒有名相的真實上，纔變成了這個世界，所以，這是一個幻化的世界，幻化最深的就是時間。修煉瑜伽的最高關口就是總制，達到了它，就可以看清時間造幻的本質。因此，《瑜伽經》認為，人們體驗到的時間是剎那造幻組成的，祇有通過辨別智，看穿時間的把戲，纔能脫開塵世，進入三昧純意識和神我。這有點像胡塞爾（E. G. A. Husserl, 1859—1938）的時間現象學的一種說法，認為內時間意識的根源在超時間的先驗自我。印度智者相信，看清時間的本質，就可以最後進入完全無名無相的真實世界了，所以說“人生如夢”。而中國的老莊哲學也有相關體驗，如“莊周化蝶”，大夢可能會做醒，那就是人的得道之時。

關於時間的真與幻，這裏要提到一本著作《關於時間：大爆炸暮光中的宇宙學和文化》。“大爆炸”理論是當代物理學對時間觀的新建構，與牛頓物理學的時間觀很不同。這一理論認為，人們生活的這一世界的時間有一個開頭，大爆炸則是時間的誕生。《關於時間》的作者認為，人類的直接時間感受參與構造了自己對宇宙（鐘錶）時間的看法，而人類直接體驗到的時間裏面，已經有文化和技術的共謀。五萬年前，智人的技術突進或技術爆炸，比如繪畫、弓箭、釣鉤等的發明和使用，使人類對時間的理解進入全新的一頁：

隨着物質接合的推進，出現了體驗時間的新方式。用手按揉黏土、把礦石送入火中鍛造以及在木框架上攤開毛織物，人們以全新的方式和這個物質世界相銜接，而時間也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黏土花了多長時間纔被製成了陶器？鍛造一把鐵犁又涉及多少道不同的工序？就像使得新形式文化成真的每一項發明，技術和文化想象一直得到了發展。由於時間總是存在於物質和想象間的分界面上，它會和物質接合，同時與它在文化中所驅動的變化緊密相連。^①

所以，技術的改變也重塑了意識形態，包括對時間的感受。人對時間的想法與人類的實踐活動的改變息息相關。這一時間觀，與馬克思（K. H. Marx, 1818—1883）的觀點有相近之處；不同之處在於，在這種觀點裏，想象力從深層上參與了時間觀的構成。技術與人類的想象是相互促進的，人類的想象和生產活動的改變則造就着人們的時間思想；所以，並沒有完全“客觀”的時間。比如，該書介紹了阿爾布雷克發現的“時間歧義”：“‘我把它稱為時鐘不確定性’，阿說：‘基本意思是，選擇不同的時鐘會導致不同類型的物理學。’”“它意味着，物理法則並不基本！”^②

^{①②} [美]亞當·弗蘭克：《關於時間：大爆炸暮光中的宇宙學和文化》（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謝懿譯，第21、314、315頁。

這樣看來，在物理學層面上，“時間”就可能是多樣的，因而物理學法則的基礎也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一切都在演化，包括現代性中的“時間”被加快了，擠壓了人們人生的意義境域，所以就有各種方式反對它，比如慢食運動，號召人重新體驗進食的自然時間。

四 什麼樣的時間是真時間？

所謂真時間，指的是能給人生帶來飽滿意義的時間。因為，時間是有內在尺度的，體驗時間過快過慢，都會使“活時間”喪失意義。

人類是時間化的生存者，祇有被時間鼓滿風帆的人生，纔會意趣盎然。借用弗洛伊德（S. Freud, 1856—1939）的說法，時間的加快祇是顯意識層面上的，但每個人都有潛意識，而且是更重要的部分。顯意識與潛意識的適當結合，纔能體驗到時間的原初意義；僅僅加快顯意識的時間節奏，那會扭曲人生。正是因為有了潛意識或匿名的內時間流，人的意識對自己就不是完全透明的，纔可以有薩特（J-P. Sartre, 1905—1980）講的“自欺”，纔可以有意識的分裂，“不知道自己已經知道”，或自己與自己的對話，甚至左手給右手一個禮物。時間的人生實現一定與潛意識或匿名意識場相關。所以，哲學的智慧就是要協調顯意識和潛意識，也可以說是時間的原本結構或原本含義的體現。那些哲學基本概念如“永恆”“本原”“理念”“天道”“仁義”“開悟”“梵我”，其實不是超時間的，如果它們是真智慧，就應該是完整的原時間的實現渠道。比如，堯舜時代的《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表現完全悠哉遊哉的生活，所以，堯舜時代纔是最好的時代。

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 Bergson, 1859—1941）曾出版過很有名的《時間與自由意志》一書，他的一篇文章《關於變易的知覺》談到了傳統西方哲學希望驅逐變化，那是不可能成功的。他則要恢復對變化的感受，生命就是綿延，就是直接體驗到原時間的狀態。但是，時間不能被空間化，空間化就會產生悖論。比如，在“芝諾悖論”中，阿基里斯（Αχιλλεύς）的奔跑被空間化為在跑道上的綫段，這樣他就永遠追不上在前面爬的烏龜了。

在“飛矢不動”的悖論中，如果飛矢所處的一個瞬間也包含了過去和未來，那麼飛矢是不是也不動呢？當然不是。而且，由於包含了極微的過去和未來，瞬間與瞬間也是不可以割裂的。如果進入到綿延，那麼，瞬間也是在動的。正是因為空間化（牛頓式的空間化）了時間，所以，時間對人類生活的原本構造就不見了。比如音樂，天籟之聲，如果聽不到這種深層的歌吟，思想就開始萎縮；祇有通過哲學和藝術，尤其是古典音樂，啓動以往（時間）的感受，讓人重新恢復到綿延中，纔能感受生活真正的意義。正如前面提到的折紙一樣，一個好的人生，就是將“時紙”折疊得當——尺度合適，維度相通，相互激發而不是相互扼制，相互扶持而非相互妨礙；動態平衡，讓出其不意獲得自維持——的生活。這就是善的好的人生，也就是儒家的中道和至誠。

這裏還想順便評論一下法國當代學者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在新著《論“時間”：生活哲學的要素》^①中的觀點。他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真正的時間觀，因為中國人沒有永恆觀念，而時間觀都是相對於永恆者而言的，陰陽觀念祇能用來理解過程，而不是時間本身。先不說認定“永恆是理解時間的前提”是否成立，就是用當代西方哲學家的例子也可以反駁這種膚淺的斷言。如果說推翻永恆設定、大講“過程”的柏格森、海德格爾談的“時間”是哲理時間觀（朱利安也承認），那為什麼中國古人講過程的“變易時中”觀就不是哲理時間觀呢？由此可見，西方傳統哲學的用永恆來壓時間的思路，在當代思想界還是很有些市場的，儘管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提出已經有一個世紀了。

時間是儒家的根本問題。朱利安把中國儒家說的“時”當作謀略化的時機，是很片面的。儒

^① [法]朱利安：《論“時間”：生活哲學的要素》（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張君懿譯。

家講的“時間”，既有“時”機，更有天“時”，讓人體驗到合乎時間化理性的倫理道德和終極真理。之所以君子可以“殺身成仁”，是因為體驗得深了，當時間要求的時候人纔會去行動甚至獻身。列維納斯（E. Levinas, 1906—1995）說過，家是時間之源^①。他的思考是非常有厚度的。儒家認為家庭就是時間關係，所以“親親”應該被理解為道德之源。然而，不能僅僅通過“親親”，還要通過“六藝”來教育學生成為君子，將“親親”和“孝慈”擴展到他人和社會。

結語

哲學所愛的智慧，首先是時間智慧，因此，哲學有其他學術（包括科學）所不可替代的終極功能。它是生命的自由之學，讓人能思考其人生之學，甚至啟發人去探尋更有原時間性的人生。一切重大的禍害，都是原時間的扭曲或喪失；而一切重大的改進或真實革命，都是原時間的再現和復活。這種“革命”，不是英文中“revolution”的含義，而是對時間的復原，是《周易》“革”卦中講的“革命”，參與到對時間的更化轉變。祇有在這種重大的轉化中，纔能發現時間的本質。為什麼造反的商湯和周武王是聖王，而某些造反就祇是造反？因為，湯、武適時，順乎天（天時）而應乎人（人性），是人生最應該追尋的。孟子（約前372—約前289）之所以讚頌孔子（前551—前479）“聖之時者也”，在於孔子的“作《春秋》”中就有革命。

[編者註：2017年1月5日，張祥龍教授應邀在“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哲學論壇”發表演講，該演講由哲學系主任陳建洪教授主持；受《南國學術》編輯部委託，胡曉魯整理出了文字稿。該文係根據整理稿編輯加工而成，並已由作者審定。演講結束後的問答環節，參見下面的“附錄”部分。]

附錄：

提問一：人們反思過去的事情時，不同片段的聯結構成完整的感受，那麼，時間必須依靠別的東西纔能構造時間感嗎？

回答：是的。時間流的再構造肯定與對時間對象的體驗有關，而這種體驗中就有我們遭遇到的外部刺激的引發。這樣的對象化時間體驗，對於我們來說是不連貫的，或者說是片段的；但這不連貫下面還有潛在的意識流的保存、事先綜合和各種鋪墊，使得這些外部刺激可以引發感知。現代心理學甚至認知科學在逐漸確證這種潛在的鋪墊及其所依據的意識流的存在。因此可以說，我們的意識的根基是連續時間化的。當然，也許你會舉例說，柏拉圖的理念就是非時間的，他的體驗是非時間的並奠基了時間構成。這種思路現在仍然頗有影響，但當代西方哲學的前沿進展已經對這種超時間的時間觀做了批判。就是說，原時間還是時間，既在時間中，又是時間的源頭。

提問二：剛纔您提到，現代物理學已經威脅到了人們的生活。我想請教您，傳統的現象學是如何應對現代物理學對時間的研究的？

回答：現象學對現代物理的研究是有吸收的。比如，海德格爾和他的好朋友海森堡（W. K. Heisenberg, 1901—1976）就有過很多交流，尤其是關於量子力學的認識。現在網上有一篇朱清時教授關於量子力學的哲學解說，我讀後感覺很好！量子力學恰恰使得原本的時間有一種依稀的物理學表達。當我們沒有觀察量子時，它們處在疊加狀態，也就是一個量子既在甲又不在甲，有點像包含過去、將來的瞬間；然後，當我們觀察量子時，也就是人的意識和行為進入這疊加中時，它就塌縮了，變成或者在甲或者在乙的確定存在狀態了，也就是日常和傳統科學的理性習慣的形

^① [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朱剛譯，第299頁。

態了。所以，原時間不存在完全的一個點，認識量子的時候主客已經交織在一起，塌縮纔存在，也纔有可以準確測量的時間點。所以，現象學對物理學是開放的，或者說兩者的時間觀在某些點上是有共鳴的。但是，高科技的無限制發展，在不斷扭曲人們的原時間，造成生存的意義危機和現實威脅。這一狀況，早就引起了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關注，他們對崇拜高科技導致的“歐洲科學危機”“人類生存危機”所作的批判，也是現象學與當代物理學的一種關係。現代西方有一些敏感的知識分子，對人類未來幾乎不抱希望，比如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所以就有了移民太空的呼聲。由此可見，人類的現代追尋是有問題的。

提問三：您剛纔講到，小說《三體》不像奧古斯丁對時間的理解那麼生動，這可能與時間的不可捉摸性有關。我們希望抓住現在，但時間在流變，我們真的可以抓住現在嗎？我們是通過媒介如眼、耳、鼻來感受時間的，但這些感覺是要經過時間的，所以，我們感覺到的似乎永遠不是現在？

回答：我講的恰恰就是這個意思。西方哲學家認為人們祇能抓住現在，奧古斯丁說時間很難捉摸，不能把時間分為過去、現在和將來，一旦區分就很難捉摸了。奧古斯丁認為，靠人們心靈的延展，纔能把握時間，所以，這種體驗不是瞬間，而是由內在的連續性和持續性呈現的。由於奧古斯丁的思想具有當代哲學含義，海德格爾、胡塞爾、維特根斯坦（L. J. J. Wittgenstein, 1889—1951）都在引用他，討論他。但奧古斯丁沒有講明白心靈延展的含義，他最後還是把“現在”變成一種超時間的總在場者了。他講的心靈延展被關閉在持續在場的現在中，可以與真實的過去、將來隔絕，這與現象學及我理解的時間是不一樣的。你剛剛說的這一點，是我們理解時間的起點；沒有純粹的或自立的現在，它一定包含了過去和將來。

提問四：您說“一切禍害，都是時間的扭曲和喪失”，我想知道，這裏的時間是指個體的還是群體的時間？

回答：我這裏說的時間是原本的時間，既可以是個體的，也可以是群體的。確實存在着原本的時間或還沒有被扭曲的時間，如健全童年中的孩子們體驗到的時間，印第安人傳統打獵採集的生活形態中所經驗的時間，這些都是原本的時間。文明出現後，尤其是現代性會導致時間的扭曲，是對原本時間內在結構的粗暴干涉，它要加工、管制和規定你如何體驗時間，時間就會變得狹小、對象化、硬化，失去它本身的構造原意義的能力。比如，工業生產中的“泰羅制”，工人以完全被規定的方式生產，就像卓別林（C. Chaplin, 1889—1977）在電影《摩登時代》裏所表現的那樣。